

黨內文件
遺失必究

華北解放區財政經濟會議文獻附件

晉冀魯豫邊區（集）政聯合財經辦事處翻印

一九四七、十一月

目 錄

一、陝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	一一
二、山東的財政經濟工作	三三
三、山東的羣衆生產工作	六五
四、晉冀魯豫的財政經濟工作	九七
五、晉察冀邊區的財經概況	一六九
六、晉綏財經工作報告	二〇三
七、晉冀魯豫中央局關於財經工作決定	二二七
八、晉冀魯豫中央局關於平穩物價鞏固本幣的指示	二三五
九、晉冀魯豫中央局關於開展生產運動的指示	二三九
十、晉冀魯豫中央局關於厲行節約渡過困難迎接光明的指示	二四五
十一、動員起來，經濟上再打一個勝仗，保證戰時供給	二四九
十二、華東中央局關於克服目前經濟危機與今後財政經濟方針的指示	二六七
十三、晉察冀中央局關於財經工作的決定	二七三

陝甘寧邊區的財經工作

南漢宸

許多人不了解，為什麼陝甘寧邊區在敵頑重重封鎖下，以那樣窮的地區，供給那樣多說難產的人員，不僅渡過困難，且能達到豐衣足食，其實道理很簡單，我們不過依靠了毛主席的方針，加上大家的兩隻手而已。

白如冰同志是在營經接到延安電報來參加會議，所以沒有帶陝甘寧邊區的材料。現在只能就我們的記憶，分別將自衛戰爭爆發前的財政，金融，貿易工作，作簡略介紹。現在敵人十餘萬已佔延安，十年和平建設，經不住敵人的破壞，目前情況如何還不知道。

一、財政

陝甘寧邊區所處的環境：1 地廣人稀，交通不便。全區面積四十四萬方里，人口一五〇萬，平均每方里不到三個半人，耕地一五〇〇餘萬畝。大車路很少，交通依靠小毛驢。抗戰前舊治十三縣中，有不少的縣，其收入不足本身每月僅三六〇元的政費開支，尚需省方協濟，其實窮可知而知。邊區政府成立之後，劃為五個專區，轄三十二縣市。2 生產落後，出入口不平衡。勞動

英雄吳滿有的地，每垧（三畝）亦僅收穀六斗，平均每畝可收小米一斗至一斗二升，種麥子產量較多，戰前根本談不到工業，一半以上縣份的人民不懂紡織，除糧食羊毛外，其它一切日用所需，從棉布到針錢，甚至吃飯的碗，均靠外來，棉紡紡織雖幾年來已有很大發展。但目前尚不能自給，還需要半數以上的進口，抗戰以來，在敵頑的嚴密封鎖下，曾進行了艱難、激烈而殘酷的經濟鬥爭，由於缺乏出口物資，嚴重入超。對敵貿易，經常在被動中，即使換回一些，也不能等價，吃虧很大，所換之貨質量很差，關中所產較好布為西安將軍征收，次布上蔣區市場，最差的經過層層封鎖方能進入邊區，如果別的解放區用的是三等貨，我們是欲求「三等貨」而不易得；因為買不到棉花，曾穿過一年羊毛裝的衣服和被子，所謂「白天一身毛，晚上二嘴毛」氣味很臭。戰時的總後方，龐大的財政開支與戰後的經濟條件，極不相稱，以一四〇餘萬人口，最多時負粗脫離生產人員十二萬，牲口八六六四，如每一牲口合三人消耗，則脫離生產人數超過總人口的百分之十，日寇投降，曾一度減少，現在又有增加，而在這些人數中，學校及機關幹部佔多數，供給標準不同於戰士，事業費大，這樣龐大的開支，遠非羣衆所能全部負擔。

十年來的光景是怎樣渡過的呢？

一九三七年和平實現，財政政策是休養民力，爭取外援，當時長期內戰方告結束，農村經濟受到很大破壞，必須給人民以適當的休養，三七，三八兩年均只向人民征募公糧一萬石，此外再無任何負擔。三九年征糧五萬石，向商人募集衣捐十萬元，糧款所需，大都靠八路軍分給後方的軍餉及國內外各地的援助，三九年的財政開支中外援佔百分之八七·五。一九四〇年，國民黨封鎖加緊，外援很難進來，八路軍每月僅五十萬元的軍餉，亦曾一度停發，我方開始建立稅局，但收入僅十萬餘元，年終總結，全部開支中，外援仍佔百分之七十四強。

一九四一年，人民經濟經過幾年休養，已由恢復而有所發展。皖南事變後，外援完全斷絕，財政被迫急劇走上自給，當時困難到提出餓死解散與大家動手生產的三條道路，其嚴重可想而知。爲克服這一嚴重困難，曾採取如下措施：一月廿八號邊區政府決定，禁止法幣流通，發行邊鈔，採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財政方針，發給各部隊機關一部生產資金，各自經營，解決其經費開支，當時爲應急需，各部門除投入一小部資金於工農業外，大都從事商業，雖解決了問題，渡過困難，建立了生產基礎，但不可避免的互相競爭，各自爲政，苦樂不均，走私漏稅的毛病也就產生了，致財政貿易金融都陷於很混亂狀態，如不很快克服，則財政不能上軌道，一切制度無法建立，其混亂將不堪設想，因之要求統籌統支。如果當時銀行不是那樣保守，能在發行上更多的投入生產，改變當時四人合用一把鐵頭，幾個人合用一架紡車，因無錢買工具，致使勞動力浪費的不合理的現象，雖可能稍微提高物價於一時，但對以後的生產與財政基礎，當大有裨益。

在糧食上，四〇年對軍需的嚴重性估計不足，還沒有改變單純的憑入爲出的財政方針，僅征公糧九萬石，四一年春，人數增加，缺糧太多，四月初即開糧荒，又無通盤計劃，曾被迫下令，兩次借糧，一次征購，個別地區如延安鄜縣，借糧有達八九次的，擾民太甚，但糧食供給，仍不能保證，有的部隊兩天沒有能吃上飯。

爲彌補財政之急需，夏初發行救國公債，原定五〇〇萬元，實收六一八萬元，但羣衆不解公債爲何物，亦不知政府應歸還，大都將債券毀棄，待還本時，僅收同十之一二，這說明目前我們所處之農村情況，推行公債還是很困難的。

爲了爭取出入口平衡，增加財政收入，曾採政治動員方式，發動羣衆運鹽出口，並爲政府運公鹽六萬畝，很多的縣委書記縣長，親自動手，帶領羣衆，往邊奔走，但由於缺乏經濟力量之扶

均，與出入口貿易未獲勝利，結果費力很大，其所收效果，遠遜於我們所花的力量。

經過一年的實踐，充分的證明，財政上狹隘的「仁政」觀點主觀上企圖減輕人民負擔，而實際却大大擾了民，最後還不得不更加重了人民的負擔，這種不顧抗戰需要，不公私兼顧，而片面的宋襄公之仁，實際是大不仁政。

本年開支，共二四四七萬，銀行透支一〇五四萬，其餘靠公債，稅收，及企業經營的收入。秋收時提出征收公糧二十萬石，公草二千六百萬斤，政府經過很慎重的考慮，最後方獲通過，我們堅持了這一方針，向羣衆說明，過去借糧一律歸還，明年不再借，再不宜買糧，望羣衆能予以贊助，在我們廣大幹部的工作和羣衆的保護下，終於勝利完成，這是邊區人民負擔最重的一年。由此使邊區糧食工作得喘過一口氣，並成爲糧草工作保證供給的一個轉捩點。

四二年的財政方針是統籌統支爲主，生產自給爲輔，保證糧食、草料、被服、食鹽、紙張、實報六大實物供給，這就加重了財政任務，減輕機關負擔，一方面是爲克服各自爲政，苦樂不均，混亂的現象，同時爲培養各單位生產能力，以充實其自給力量，當時經費來源，稅收很少，銀行又不能透支，主要靠企業經營盈利。但年度之始既無資本，路綫亦不明，必需依靠與商人密切結合，出奇制勝，以頑固之貨，售予頑固，賺得頑幣，購回布棉，進行了勝利的對頑貿易鬥爭，打了幾個勝仗，才解決了穿衣，渡過了上半年難關。待秋後，自己積蓄了力量，方逐漸擺脫財政上被動，喘過一口氣來。

經過一年的努力，混亂的毛病有部份的克服，逐漸建立起一套財政制度，各機關部隊專心一意搞生產也打下一些基礎，但在地區遼闊交通不便的情況下，過分集中解決問題不及時，照顧下級具體困難不够是其缺點。

本年收入二萬七千萬，開支一萬八千萬，節餘九千七百萬，銀行透支一千一百八十一萬，並不是現款，而且上年留守兵團借銀行之款，轉到財庫，佔全部財政收入中的百分之四。財政上發出生產貸款一千八百萬，超過銀行透支。企業盈利是收入的主要來源，佔全部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節餘的是物資非現款，所以尚不能償還銀行透支。

秋征公糧十六萬石，公草一千六百萬斤，較之上年度減少糧四萬石，草一千萬斤。

年多高幹會上毛主席明確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四三年為改進統籌統支滲透於集中的缺點，確定統一領導分區統籌的財政方針。在統一的政策標準制度下分區為單位進行統籌，根據各區脫離生產人員之多寡，生產基礎之強弱，地方稅收入情況，邊區給以一定的補助，包給各分區，特別重要的是這一年中晉綏予我們的莫大援助，兩區步調一致，取得對頑貿易的勝利，這是生產最發展，日子最好過的一年。

七月，胡宗南親到洛川佈置進攻邊區，內戰危機一觸即發。對外貿易一時因戰局而中斷，應及各項土產均不能運出，法幣來源斷絕，現存少數法幣。又必需儲待急用，財政上沒有積蓄，為支付戰爭的龐大開支，準備大規模的戰爭爆發後，公家所需多製的布棉，而東三縣棉花上市，政府不准人民自由出口，財庫就必須收購，以保證冬裝及紡織之用，因之被迫大量發行，犯了盲目樂觀，沒有照顧全面的錯誤。八、九、十三個月中透支十億，緊要物資，金融波動很大，邊幣與六元匯至十三元，方能兌一元法幣。直至十一月反共高潮過去，遂停止發行，停發經費，積極籌織出口，方才穩定下來。

本年不僅農業生產得到很大的發展，部隊機關生產亦獲得偉大成果。儲糧食一項，即交公八萬六千餘石，大公發給少數獎金，但鋪張浪費，也大有增加。有的部隊每人每月吃肉八斤，本率

供給標準，已經有點高，機關部隊又從生產上補助一些，成為比賽享受的高低，各種開支都放手了，沒有注意到節約儲蓄。

本年爲統一領導陝甘寧及晉綏兩區的財經方針，與加強對外鬥爭的領導，成立西北財經辦事處，賀司令員負責親自動手，這就進一步的達到對外貿易的統一，便利於我之價格鬥爭，增加了財政收入，並確定僅以企業收入的百分之二十交財政任務，其餘作家務之積累，財經工作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建立了雄厚的大公家務。歲末勞英大會上提出爭取耕三餘一的號召。

本年度開支共六十一億，銀行透支十億，收入中生產自給第一，其次爲企業收入，取之於民的各種稅收，加上十萬馱公鹽共達全部財政收入的百分之十一，而財政上支付的生產貸款，即佔全部的百分之十三，超過了取之於民的比例。這是我們執行毛主席正確的發展方針的具體表現，有一紳士曾對我說：你們很費力的向人民要東西，又給與人民，何不也不要也不給，公私都省事呢？這種地主立場的辦法，我們是不能採取的，應該要的必須要，應該給的必須給，是我們的階級立場，也是我們的任務。

四四年的方針是節約儲蓄，克服浪費，增加生產自給，減少財政開支，以積蓄力量備戰備荒，取消對各分區補助，只把牲畜交易費斗個，劃給地方，增加部隊機關自給任務，分別具體情況，確定生產計劃，普遍的降低供給標準，較之上年伙食部份減少百分之五十二，辦公費減少百分之四十九。但在後一個時期領導放鬆，各機關又都大事建築與購置器具，鋪張浪費又抬頭了。幾個月中浪費了不少。全年收支約一百億元，銀行沒有透支，做到財政收支平衡，上年儲存物資，在被服供給及物價穩定上，起了很大作用。銀行發行完全用於生產，共放出生產貸款十七餘億，內農貸一億，工貸二億，紡織四億八千萬，新四部隊生產資金七億，前方回延部隊路過延安時，

每人給衣服、鐵頭及生產資金，由生產上扣負一定開支，在對外貿易上，用鹽及其它土產換回金子法幣物資交給銀行，已逐漸把銀行家務建立起來，其準備金達其總發行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

本年度公糧征收十六萬石，公草一千六百萬斤。

四五年提出生產節約，長期打算，積蓄物資，準備反攻的方針。由於幾年來農業得到很大的發展，而工業遠遠落後於農業。農工業品剪刀差加大，穀賤傷農，春耕時農民生產情緒低落，當時企圖在工業品價格壓不下去的情況下，用人爲的方法去提高糧價，利用遲雨機會，強調防旱備荒，雖刺激了糧價於一時，但收效不大，不能持久，貿易公司用棉花與粟交換糧，以幫助紡織，提高糧價。當時機關部隊供給標準減低了，生產增加了，各機關都挖苦菜，準備荒年到來的食物，這在節約上起的作用很大，但到日本投降以後又放鬆了，開支又逐日增加起來。

日寇投降時，大公所有家務足用一年，各小公皆有積蓄，大批幹部人員出發有力，盡量發給了必要的路費和衣服牲口的補充。本年度征收公糧十二萬五千石，公草一千二百萬斤，公鹽八萬畝。由於食鹽銷路減少，鹽稅收入銳減，財政感到困難，動用一部家務，尚能做到收支平衡。

四六年的方針是復員生產，和平建設。當時財政感到很大困難，其原因：一是部隊出發生產者減少，留下老弱婦女兒童難於從事生產，尚需大公增加供給。食鹽銷路減少，使僅次於企業經營之鹽稅收入大大減少。自給工業部份停工或減產，日寇投降物價暴跌工業無利無銷路，銀行沒有給以必要的扶持。物價暴跌時，公私商店及合作社低價拋售物資，市場混亂，交易部份停頓，銀行沒有掌握握物資，穩定物價，反而緊縮貨幣致物價更慘跌，不久又回漲，大小公家都吃了虧，加上和平思想，機關部隊生產放鬆，要求生活標準提高，開支加大，造就大大的削弱各小公的家務。

，糧之時局開展，事業費開支有很大的增加。

爲克服困難曾採用如下辦法：

一、宣佈部份的停發經費，實際並未停止，僅額到沒有新的增加。二、大力推銷土產，組織出口，成績很好。三、十月後備戰，貿易公司利用時機，一月內爭取八十萬斤棉花的任務，勝利完成。物價平穩，供給得到保證。四、堅持制度嚴行節約，首先由中央機關開始，負責同志，以身作則，收效很大，過去積累家務現向部份存在。

現在講糧食工作：

糧食供給是我們保證軍需最重要的工作，我們的糧食來源有三：取之於外援的採購，取之於民的征收，取之於已的生產。從三七至三九年主要的依靠外援，從武漢、西安、洛川等地採買。當時不應當也不可能向老百姓多要。四〇年以後直到四二年軍需增加，糧食來源不得不主要的絕大部份的取之於民，向老百姓征收，我們對人民的幫助，從組織農工、按戶計劃等組織方面的多，資力幫助較少。四二年後，取之於已的糧食生產大大增加，向人民要的需要減少，資力上對軍需的幫助也有了增加。四三年提出耕三餘一的就召，經過數年來的努力雖未完全達到，但已做到家家有餘糧。目前全區共有餘糧六十二萬石，在和平時期若遇荒年，可勉強渡過一年。但自衛戰爭爆發後，除供給我大軍需要外，再加上敵人的掠奪、搶劫，全區糧食的困難還是存在著。

根據財政廳調查，歷年糧食產量與公糧征收列表如下：（實際的生產量可能比此數多些）

時 間	糧 食 產 量	公 糧 徵 收	征收佔產量百分比
一九三七	一、二六〇、〇〇〇石	一〇、〇〇〇石	〇・七九
一九三八	一、二七〇、〇〇〇石	一〇、〇〇〇石	〇・七八

計劃，經邊府財政廳審核批准後方可征收，總數由財廳掌握，公糧與附加糧一次征收，統一入倉，各地在地方糧內，在一定的標準制度下，可自由處理，事後呈報備案。

截至去年年底，除所征收的十六萬三千石糧食外，尚有一些餘糧，在和平時可供備荒之用，自衛戰爭爆發後，人數增加，只能補助戰時之急需，但需糧區與儲糧區之不一致的矛盾，因交通不便，困難解決。

在征收政策上，三十七年十月曾頒佈救國公糧征收條例，規定每人全年收入不足小米三百斤者免征，收入三百至四百五十斤者征百分之一，四百五十一至七百五十斤者征百分之二，七百五十一至一千〇五十斤者征百分之三，一千〇五十一至一千五百斤者征百分之四，一千五百〇一以上者征百分之五，但當時並未按此條例嚴格執行，由於征收量很少，大都採用動員勸募方式，負擔極小，多偏重在極少數的富有者，直到四〇年仍是一種勸募性的攤派，負擔主要集中在中農以上各

一九三九	一、三七〇、〇〇〇石	五〇、〇〇〇石	三、六三
一九四〇	一、四三〇、〇〇〇石	九〇、〇〇〇石	六、二九
一九四一	一、四七〇、〇〇〇石	二〇〇、〇〇〇石	一三、三三
一九四二	一、五〇〇、〇〇〇石	一六〇、〇〇〇石	一〇、六九
一九四三	一、六〇〇、〇〇〇石	一八〇、〇〇〇石	一一、二五
一九四四	一、七五〇、〇〇〇石	一六〇、〇〇〇石	九
一九四五	一、六〇〇、〇〇〇石	一二五、〇〇〇石	七、八
一九四六	一、八三〇、一四三石	一六三、〇〇〇石	八、九

階層，「抓大頭」「揪目標」的現象，相當普遍。

到四一年，爲完成二十萬石公糧，二千六百萬斤公草的龐大任務，在征收政策上改訂條例，降低起征點，爲每人平均收入五斗以下者免征（關中隴東兩分區免征點爲每人八斗），用以擴大負擔而至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強調深入調查，執行條例，糧米入倉，斤草入站，當時稅率爲每人收入五斗者起征稅率爲百分之五，收入六斗者征百分之六，七斗者征百分之七，每收入加一斗，稅率即增百分之一，直至每人收入三十斗征百分之三十爲止，再不累進，照此條例與民主評議相結合。執行二年發現有如下問題，急待改進。歷年公糧之征收，均爲自上而下的分配，自上而下的調查，只能在執行征收任務上起各階級公平合理的作用，但分配數字難於精確，不盡符合各地情況。因之僅能作到一村內各階層負擔的公平合理，而各個村與村，區與區，縣與縣，專區與專區間，負擔很難平衡，按農業實際收入計稅，多打多出，少打少出，負擔量不盡相對而定，不足以鼓勵農民生產情緒。其次新富農與舊有與地主常友文，人口相同，收入亦同，累進相同，征收量相等，則無視於勤勞所得與不勞而獲包括投資在內的，總收益與地主純收益的區別，難於實際征收中，羣衆的民主評議，會加以改變，但救國公糧條例本身確有此缺點，及稅率上不太合理之金額累進與不能相對固定，每年需用大力調查，等均急待改進。

四二年冬高幹會上即提出準備實行農業統一累進稅。四三年起着手進行研究，經數年來試行，已獲初步經驗，以常年產量較之按實際收入計稅，更能刺激生產。征收土地稅，除農業消耗用以調劑農民與地主間的負擔。免稅點在陝甘寧邊區地瘠民貧，財政任務龐大的情況下，不能除（因如每人平均減去六斗的免稅點，則全邊區將除去八十餘萬石，再除新開荒抗屬榮軍移難民及植棉，種藍等特殊作物獎勵之減免，將超過總產量的二分之一以上），全額累進雖不甚合理，

但幹部人民文化水平低，超額累進，計算不便，其推行尚待時日。

我們雖曾以相當力量從事於農業統一累進稅的研究，並亦獲得一些成果，且在數縣試行，但畢竟由於幹部條件，及其它原因，至今猶感不簡便未能普遍推行。

我們的糧食保管倉庫工作，八九年來的發展，是由分散的小倉庫走向集中的大倉庫。倉庫的設置也是由按征收分散的就地設庫入倉，改變到適應供給需要，有重點的在併給區或交通沿線建立糧倉、草站。糧倉的管理，是由各地分管走向集中糧食局，直接垂直領導統一管理。在八年的保管工作中，曾湧現了不少優秀模範工作者，創造了許多好的經驗，如延安蟠龍倉庫主任何崇萬，在一年經過二萬石糧食的進出中，損耗僅八石，佔總數的萬分之二，同時他與羣衆關係很好，每次老百姓交公糧時灑落在地上的糧食，他都爲之撿淨還給羣衆，所以他不僅能做到損耗極少，且獲得羣衆的擁護。

過斗員關麻子，經過長征，作過斗員七八年，積極、負責、認真，衆口同聲都說他公道，從不馬虎，賄私。清倉清賬是檢查保管工作的重要方法，經過幾年來對各個倉庫逐一清理，糧食局已能做到掌握大部份存糧較大的倉庫，定旬報制度，糧食的管理較有成績。而草的保管幾年來雖有改善，但依然很差，每年仍有不少損失。這一套保管辦法，在和平時期是較合適的。目前大規模的戰爭下需要有所改變。

四一年後，全邊區糧食供應總的收支是平衡而且有餘的，但延屬分區需供人數佔全部的百分之五十七，牲口佔百分之六十三，需要量佔全部的百分之六十六，而征收糧食佔全部的五分之

二、這就產生供需上極大的不平衡，特別是延安市週圍需糧五萬四千餘石，而延安縣延安市安塞縣三地全部公糧共計僅有二萬六千四百五十石，相差達一倍以上，因之，調劑供需便是供給上的中心工作，爲此，曾採取如下辦法：

一、征收與供給結合：公糧征收量的分配，不僅要根據政治經濟諸條件，同時應十分注意，照顧需要，四一年備接經濟條件青通的征收公草所引起不替草區公草的很大浪費的教訓。促使我們對這一點加以改變。

二、建立據點倉庫，公糧向需要方向集中，在距延安六十至九十里一站路的交通線上，甘谷驛，永坪，蟠龍，拾安等地設據點倉庫，成爲供給中心的外圍組織，它可打破行政區劃，接受距其一站路半徑內之公糧，及二站以內的轉運糧，以節省羣衆及機關的運輸力。

三、合理的分配，盡量的減少民力運輸，組織部隊機關運輸，發展糧食局運輸隊，規定一站路以內由機關自運，二、三站者動員羣衆在農閑時集體運送至據點倉庫，使糧食局運輸隊成爲機動突擊的力量，以備遠道及應急之用。運輸隊的管理，一改過去對一部份人的供給制，與另一部份人的僱傭制爲合作分紅後，有很大的改進，按運輸之斤數計算運費，將運輸力提高了一大步達到增加百分之四十五，運費反而降低了百分之八，同時運輸隊建立驢馬店，木鋪，鐵鋪，皮麻鋪鋪等一套，與保證其供給的作坊，除解決其本身的需要，供其價廉物美東西外，尚有盈利。

四、實行麥收時征夏，用以保證供給，調劑麥食及便利於人民的交納。

五、餘糧區賣糧或征收代金，在缺糧區購糧，并可在高價有利時組織輸糧出口，用以部份的彌補一買一賣間價格的差額。

六、羣衆兌交公糧，在糧價較高而非我之需糧區，羣衆爲節省其轉運勞力，請求在我需糧區

購糧繳納，甚有願以一石二斗交作一石者；此辦法未普遍採用，如經我們很好的組織，似可俾民利公。

七、發給各機關草料代金，劃定市場，分頭採購，此一辦法，由於大家多不遵守既分市場，形成延安市上爭購，毛病甚多。

八、由糧食局收買各單位的生產糧、節約糧，並限制各機關不得私自出賣。

九、動員組織各機關割草，自給馬草三個月，行之數年，均收成效。

十、以人就食，以馬就草，調劑被供給人員牲口，就食有餘糧地區。

十一、糧食供給上，按季審批，按月撥付，以防超支，與作糧食投機，部隊移動，又保證其支用方便。

歷年部隊與地方工作人員的糧食供給標準曾經如下的變化：

均以每人每日為標準計（小米老秤）

時間	四一以前	四二	四三	四四	四五	四六	現在
軍隊	斤半	斤半	斤半	斤半	斤半	斤半	斤半
地方	斤半	斤四兩	斤三兩	一斤	十五兩	斤二兩	一斤

當四五年六月備荒時，地方人員糧食標準會降至每人每日十五兩，並未影響大家吃不飽，據我們調查，西北局每人一天吃糧十至十一兩，延大十二兩，中央黨校十至十三兩，楊家嶺全年節約八百石，邊府節約六百石，其原因主要是管理改善的結果，同時蔬菜增加亦是重要原因，如三五九旅為完成交公糧的任務就吃了三個月的山藥蛋。我們對傷病員，老弱婦孺的照顧，一應

是沒有放鬆的。

預決算審計制度之中心工作，是掌握人員馬匹的確數，廢除一切吃空份糧的漏洞，備四二年廢止開會、住醫院、客飯、訓練班、超支等領空份糧現象，實行糧票（實即飯票）制度，一年之中即較前節省糧達一萬九千餘石。

為避免糧票滿天飛的缺點，在糧糧上均統一的採用支付令，搭配發少數糧票，只供小額零糧之用。

再講稅務：

一九四〇年成立邊區稅局，開始征收貨物稅與商業稅，貨物稅的征收分出入口稅及過境稅兩種，其方針為保護生產，配合貿易，增加財政收入，用稅收以保護生產，雖屬必需，但仍有一定限度，必須發展自己生產，能做到成本低、質量好，產量多方克奏效，如邊區煉鐵成功後，我則初以禁入，繼改重稅加以保護，當時外鐵入口，價僅每斤四百元，稅率百分之百，政府又津貼鐵廠每斤三百元，結果依然競爭不過，最後取消。邊區雖至今尚缺布近一半，但布疋進口仍定稅率活動於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三十之間，目的是為配合貿易金融生產及各地需要量的季節性。自我定入口紙煙一律沒收後，邊產紙煙有很大發展，僅關東板橋一村，即有紙煙作坊六十餘家，一時曾獲大利，隨即大都粗製濫造，質量低劣，我稅收雖用不分優劣同樣征稅的辦法，期以刺激提高其質量，但由於無計劃盲目的生產，去年外來紙煙的驟繁，紙煙大量進口，外匯的供給增加，邊產紙煙受到打擊，國民經濟受到損失，致一時紙煙的供應業繁榮，曇花一現，不久之後，大都歸台。

在我全部入口貨物中，主，是有足棉花，其佔入口總數之比例，前三年為百分之七十五，四年為百分之六十八，四五上半年是淡月為百分之四十五點七，若與下半年旺月相平均，估計在百分之六十，四六年為百分之五十五，從這比例漸減的數字，可以看出生產的發展，對外的依賴已日益減少。

延安市上所見之非必需品與半必需品之入境，是由於爲了掩護各項主要必需品的入口，我們規定在不超過百分之十五的比例下，准予搭配進入。

營業稅：今固定與臨時兩種，原定條例固定的營業稅，按總收益累進，稅率由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三十五，以別作到農商負擔平衡。但由於賬簿憑證缺乏，調查困難，按條例征收很難執行。我們感到過去各城市由商會按雇股攤派負擔的辦法不公，主觀主義的企圖按納收益用百分比累進征收，作了幾年行不通，征收辦法又復因過去商人所採之雇股，加以改進，使自上而下的分配征收任務，與自下而上由民主評議相結合，以三三制精神改組商會使人、中、小商人均參加商會領導，發揚商人民主評論，並組織收評委員會，以協助之，收數增加，商人反而稱便。商人負擔據我們初步統計，佔其收益的百分之十三，由於調查之不够深入，實際負擔恐尚不達此比例。臨時營業稅是對入口流動商人按交易額征收，由二萬元起征，稅率為千分之五到二百二十五萬元，累進到千分之三十停止。營業稅的收入佔全部稅收之比例：四二年佔總數的百分之十三點四，四三年佔百分之三十七，四四年佔百分之四十，其比例逐漸增加，原因是敵人的封鎖更嚴，入口困難。我之生產及內地商業發展，如安塞真武洞戰前只攤販四五家，現已增至座商百餘家，加上我們的稅收工作也有了進步。

牲畜買賣手續費稅率按百分之五，斗圓百分之三的征收，均由稅局代收，交當地政府，作爲